

乌兰夫传

(1906—1988)

《乌兰夫传》编写组

王树盛 撰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

谨 以 此 书

献给乌兰夫同志诞辰 100 周年

《乌兰夫传》编写组

组 长 王树盛

成 员 底润昆 铁木尔 巴特尔

张继龙 钱林豹

1919年至1923年
在归绥土默特旗高
等小学校读书时的
乌兰夫。



这是乌兰夫所在
的土默特旗高等小
学校第四班毕业纪
念照，前排左六为
乌兰夫。



这是1923年11
月，在北京蒙藏学校
学习的土默特旗学生
与教师合影。前排左
五为乌兰夫。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选派乌兰夫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是他出发前与佛鼎（右）在北京合影。



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的乌兰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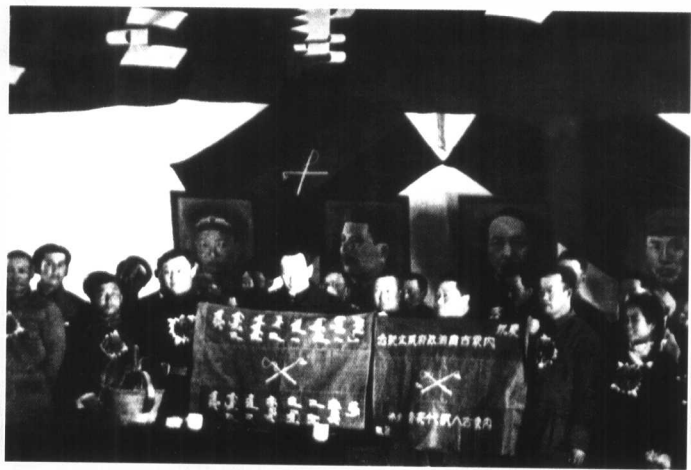


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乌兰夫被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兼常委会主席。图为乌兰夫（前中）与全体执委会委员合影。

乌兰夫(前右三)与“四三会议”选出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常委合影。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政府委员，乌兰夫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



乌兰夫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



当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时的乌兰夫（摄于1947年5月1日）。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乌兰夫出席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届全体会议。（二排右一为乌兰夫）



1954年8月，乌兰夫（左四）与内蒙古自治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合影。





1955年9月，乌兰夫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1957年8月，乌兰夫和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右一为乌兰夫)



乌兰夫与参加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内蒙古代表步入会场。

1987年8月，
率团参加内蒙古自
治区40年大庆时的
乌兰夫。



1984年6月6
日，乌兰夫副主席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民主柬埔寨主
席诺罗敦·西哈努
克亲王和夫人。



乌兰夫和乡亲
们在一起。





乌兰夫与妹妹云清（右二）、三子乌杰（右一）三儿媳杨珍云（右四）在一起。



乌兰夫与长子布赫（左一）、长儿媳珠兰其其格（左二）、三子乌杰等家人欢聚一堂。



1987年3月30日，乌兰夫会见世界儿童和平使团。



乌兰夫与本书撰稿人王树盛(右)在一起。

序

写一部全面反映乌兰夫同志革命经历和公务活动的传记——《乌兰夫传》，是多少人企盼已久的事。今天实现了，我为此而感到十分高兴。

乌兰夫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领导内蒙古民族解放和振兴的杰出领袖。清朝末年，他出生在我国北方一个比较殷实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在动荡的年代渡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我国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正在酝酿和形成的时候，他就读于北京蒙藏学校，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接受了进步思想，经受了革命的初步锻炼。1925年9月，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中，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被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1929年秋，正当我国革命处于低潮，到处都是白色恐怖的时候，乌兰夫同志奉命回国。他很快在家乡土默川扎下根，把内蒙古西部地区被敌人扑灭的革命烈火又点燃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他转向做军队方面的工作，在争取德王抗日无效，看清其决心投靠日寇后，参与了谋划和策动德王的蒙政会保安队在百灵庙的暴动，而后帮助蒙古族爱国将领云继先、白海风，在百灵庙暴动部队的基础上组建起了一支蒙古族抗日部队，并在这支部队建立和扩大了党的地下组织。七七事变后，我国全

面抗战爆发，他亲临前线，率领这支蒙古族抗日部队，参加了归绥保卫战。而后，随部队转移到鄂尔多斯高原坚持守土抗战。1941年蒋介石发起反共高潮，他被迫离开蒙古族抗日部队，奉中共中央指示回到延安。

乌兰夫同志在延安的4年，正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成熟的时候。他有幸直接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多次讲演，参加了我党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1942年延安整风，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了自己在革命斗争中亲历的经验教训，极大地加速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成长和成熟进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中央派他回内蒙古地区，把领导以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内蒙古革命的重担，放在了他的肩上。

抗战胜利后，内蒙古地区和全国一样，都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抉择。能否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建立人民民主、平等自治的内蒙古，仍然是一个需要经过严峻斗争才能解决的问题。面对这种局面，乌兰夫同志遵照党中央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在内蒙古工作中很快打开了局面。他们在张家口组建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发动群众赈济灾民，组织武装，开办学校培养亟需的军政干部，为建立自治政府准备条件。

1945年9月，曾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当过高等法院院长的补英达赖，在苏尼特右旗成立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企图把内蒙古从祖国分裂出去。在这情况下，乌兰夫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及时赶到苏尼特右旗，以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武器，说服受蒙骗的群众并使他们走上党指引的光明

大道，粉碎了这场分裂祖国的险恶阴谋。事后周恩来同志曾称赞说：这是乌兰夫“单刀赴会”，解决了大问题。

在这个期间，内蒙古东部地区有一些人成立了“东蒙古自治政府”。他们主张在内蒙古实行所谓“高度自治”、“独立自主”，并且企图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中央对这些人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政策，1946年2月24日中央明确指示：东蒙今天应以和平建国的纲领第三节第六条实行地方自治，在辽北省和热河省下成立自治区，至多要求成立一个单独的省，作为普通地方政府出现，而不应与中国形成所谓宗主国与类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不必要求单独的货币、单独的军队，甚至单独的国旗等等。并指示：“请以此方针耐心说服他们，必要时还要声明与他们无任何关系。”此前，中共中央东北局就对东蒙古的这些人做了许多工作，1945年12月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建了东蒙工作团前往东蒙地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谋求内蒙古东西部在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自治运动。1946年4月双方代表在热河承德召开了内蒙古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三会议”。在乌兰夫同志主持下，耐心交换意见，终于说服了一些人放弃了错误主张，取得共识，解决了内蒙古东西部统一实行自治的问题。

1946年秋，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为保卫内蒙古中部解放区，以利于推进刚刚兴起的自治运动，乌兰夫同志领导锡、察盟军民，创建了锡、察草原根据地。随后，根据我国解放战争和内蒙古革命形势的发展，遵照中共中央的整体部署，他又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首脑机关东移，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充分准备，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创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他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1947年5月

1日，由他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诞生，实现了近百年来内蒙古蒙古民族强烈要求民族自治的愿望。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在乌兰夫同志领导下，在解放战争中充分发挥了我东北、华北两大战区战略后方的作用，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1947年5月至1966年“文革”前的19年间，乌兰夫同志始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内蒙古的实际结合起来。在他的主持下，自治区党委明确提出了“在内蒙古实施党的各项政策，施行每一项重要措施，都必须分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使之适合各个具体环境，照顾民族特点、群众觉悟和干部条件，采取慎重的、稳进的、有步骤、有先后的工作方法”的指导思想，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比较适合内蒙古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具体政策，成功地指导和推进了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减轻了一些“左”倾政策在内蒙古的危害。经过不到20年的努力，使内蒙古的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和教育、文化体系，拓荒了高等教育，告别了手无寸铁的历史，把一个解放前贫穷落后的内蒙古，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模范自治区。

乌兰夫同志是内蒙古武装部队的主要创建人，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始终是这支部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5月1日，内蒙古武装部队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乌兰夫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乌兰夫同志一级解放勋章；同日，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的17年间，他领导下的内蒙古军区在军队建设和边防建设上，都取得了优异成绩，确保了我国北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乌兰夫被任命为中央民委副主任委员。自1954年起他连任三届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民委主任，1956年9月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长期主管全国民族工作。他呕心沥血，为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障民族平等权利，培养民族干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稳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经济、文化，逐步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方面，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之初，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极不平衡，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极其复杂，稍不慎重，就有犯严重错误甚至造成严重损失的可能。为此，1950年乌兰夫同志在向政务院作关于民族工作问题报告时，及时提出了“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稳步前进。”过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将“慎重缓进”改为“慎重稳进”，使之含义更加准确，更富有积极意义。接着中共中央又作出了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事无大小，一律请示中央的规定，保证了建国初期民族工作的健康发展。此后，1953年至1962年，在乌兰夫同志主持和参与主持下，先后召开了三次对我国民族工作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工作会议。这就是1953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民委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1957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和1962年4、5月间由全国人大民委和中央民委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全面总结了少数民族地区牧区民主改革和牧区工作的经验，确立了“慎重稳进”和“人畜两

旺”的牧区工作方针，以及“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牧区民主改革的政策。这样的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了全国少数民族牧区的稳定，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经济的稳步发展。第二次会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经验和教训，重申了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一贯政策，澄清了某些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造成的模糊认识。第三次会议是在全国对“左”的指导思想有所纠正的情况下召开的，对民族工作方面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起了很大作用。这三次全国性民族工作会议的成功和成就，不仅对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乌兰夫同志在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对我国民族工作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乌兰夫同志敢于坚持真理，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正因为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他才遭到了非难和迫害，先后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职，并多年受到监护。但是，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始终坚信真理和正义一定会胜利。

“十年动乱”后，乌兰夫同志蒙冤的问题全部被推倒，得以彻底平反。在历史的新时期，党和国家又委他以重任。在一段时间里，他既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1983年6月以后任国家副主席。此时，他已是耄耋之年，却依然壮志满怀、精神不减当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更加振奋起来，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全身心地投入了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倾全力抓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在他的领导下，经中央批示全国统战、民